

ISSN 1025-0689

東吳大學

東吳歷史學報

第十五期



東吳大學出版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臺灣 台北

ISSN 1025-0689

東吳大學

東吳歷史學報

第十五期



東吳大學出版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臺灣 台北

東吳歷史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HISTORY

第十五期

No. 15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June, 2006

發行人 **Publisher**

劉兆玄 Chao-shiuan Liu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Committee**

召集人、主編 **Chairperson, Editor-in-Chief**

李聖光 Sheng-kuang Lee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以姓氏繁簡為序)

王汎森 Fan-sen Wang

(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李東華 Tung-hua Lee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孫同勛 Tung-hsun Sun

(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陶晉生 Jing-shen Tao

(中央研究院院士/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客座教授)

編輯助理 **Editorial Assistant**

古佩玉 Pei-yu Gu

責任校對 **Proofreader**

游惠閔 Huei-min You

謝玉珍 Yu-chen Hsieh

邵學禹 Xue-yu Shao

蘇巧玲 Ling-chiao Su

東吳大學出版

臺灣 11102 臺北市士林

June, 2006

Published by Soochow University

Shih Lin,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東吳歷史學報

第十五期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目 錄

【錢穆史學研究】

- 錢穆先生章學誠研究述論……………黃兆強 1
成一家之言與通古今之變：究錢穆的史學觀點……………周如怡 41

【論文】

- 漢唐間官方山嶽祭祀的變遷—以祭祀場所的考察為中心……朱 溢 69
論宋真宗對建立與維護宋遼和平外交的心意……………蔣武雄 91
《高麗史》對於研究遼史金史的貢獻……………金渭顯 117
明代福建社會風氣的變遷……………徐 泓 145
沉默大眾的歷史：
Lynn White 與歐洲中世紀農民生活史的建構……………李聖光 173
英國歷史教育改革中的「時序」爭議……………林慈淑 207

錢穆先生章學誠研究述論*

黃兆強**

摘要

錢穆先生對章學誠（1738-1801）所作之研究主要見之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章實齋〉一章。該章之細目計有：(1)《文史通義》與經學 (2) 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 (3) 經學與史學 (4) 學問與功力 (5) 纂類與著述 (6) 著述與事功 (7) 性情與風氣 (8) 專家與通識 (9) 方法與門路 (10) 校讎與著錄 (11) 實齋學風之影響 (12) 實齋文字編年要目；即共十二目。筆者乃以該十二目為主軸，藉以闡述錢先生對實齋所作之研究。錢先生之其他著作，如《中國史學名著》、《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及《國學概論》中之相關論述，筆者亦予以充份參考。錢先生以實齋之著作為佐證，提要鉤玄地發覆了實齋學術之精髓；在解讀實齋論學之要旨方面，尤其使人讚嗟。然而，天下無十全十美的文章。筆者研究實齋有年，錢先生對實齋所作之探討，或仍不免可有商榷之處；乃於本文末以小許篇幅一伸管見焉。

關鍵詞：錢穆、章學誠、章實齋

* 本文為應江蘇省無錫江南大學之邀代表東吳大學文學院出席該校 2005 年 10 月 20-21 日所舉辦之錢穆學術思想研討會而撰寫之論文。始稿於 2005 年 9 月 3 日，完稿於 10 月 4 日，宣讀於 10 月 20 日。今修改後予以正式發表。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投稿日期：2006 年 1 月 9 日；接受刊登日期：2006 年 4 月 28 日。

一、撰文緣起

錢穆先生（1895-1990）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儒、國學大師。其學問兼涉四部。¹ 錢先生亦是教育家，嘗與近現代哲學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師君毅教授等學人創辦新亞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按即校長）²。儒家

-
- 1 經部著作，最著名者，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史部著作，計有《秦漢史》、《國史大綱》、《史記地名考》、《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等；子部書，計有《莊子纂箋》、《莊老通辨》等等；集部書，計有《理學六家詩鈔》、《湖上閒思錄》等等。按：以上四分法及所列舉諸書，不必盡確當，如《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雖歸類為經部之著作，然錢先生實以治史之法以處理相關問題；今者隸之經部著作下，藉以見錢先生學問之廣耳。此外，諸如《論語新解》、《朱子新學案》等書，更不易納入任一部類下。錢先生的著作總目，可參筆者同門師弟香港新亞研究所李木妙教授所編撰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新亞學術專刊第五十四種（香港：香港新亞研究所，1994年），頁119-183，〈錢穆教授著作目錄〉。該目錄含專著101種，其中除少部份為先生領銜編著及領銜校訂者外，其餘絕大部份是錢氏本人自撰的。論文則有九百多篇。稍一翻閱該目錄便可知錢先生學問之無涯涘；其廣涉四部又奚待辯！又有關錢氏著作之繫年（含著作目錄），尚可參考以下各論著：孟繁舉：《錢賓四先生著述繫年》，自印本（印於台灣宜蘭），1993年；汪學群，〈錢穆著述年表〉，《錢穆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1998年），頁305-310；汪學群，〈錢賓四先生學術年表〉、〈錢賓四先生著述要目〉，《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賓四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462-1518。其實，錢氏去世前，學人即有編印其著作目錄以出版者。茲舉一例：孫鼎宸，〈錢賓四先生主要著作簡介—附錢賓四先生論著年表〉，《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香港：新亞研究所，1974年）。國人目錢先生為國學大師，蓋以其治學之主軸雖不背離史學，然實兼涉四部故也。吾人或可稱先生為「以史學為研究主軸之國學大師」。其實，先生被國人（至少中國大陸學者）稱為「國學大師」，其間實有一番曲折及發展過程。此可參區志堅，〈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對錢穆的研究概況—從批判到肯定奉為國學大師之歷程〉，《聯大歷史學刊》，創刊號（香港：聯大歷史學刊編輯委員會，1998年），頁22-50。
- 2 錢先生當校長之時期為1950-65年（1964年7月至1965年6月先生休假1年，然名義上仍為校長）。若連同1949年擔任新亞書院之前身亞洲文商夜學校算起，則錢先生當校長之時期前後長達17年。參李木妙，前揭書，頁111-114；郭齊勇、汪學群，《錢穆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316-320。按：李木妙書作「亞洲文商夜學校」（頁111），郭、汪書則作「亞洲文商學院」（頁316）。另亦有作「亞洲

精神有所謂內聖外王；學問、事功不可偏廢。錢先生可謂兼之矣，固為大儒無疑。余生也晚，無緣忝列門牆，然先生眾高足，如嚴耕望、孫國棟、章群、劉家駒、羅炳綿諸先生均為筆者在香港受教育期間之業師，是以不揣孤陋，草就本文，³ 藉以宏揚錢先生的學術精粹，並藉以聆聽社會賢達之誨誥。⁴ 顧先生之學術路數最廣，其宏揚先生之學問，何以選擇先生對章學誠之研究作為拙文探究之對象？原因蓋有三端。一為清儒中先生特別欣賞實齋⁵；再者（此尤其關鍵），筆者對章學誠研究有年。⁶ 是以錢先生相關研究之旨趣及其貢獻，筆者自信最能掌握。復次，據閱覽所及，前人似從未作過相關研究。是以決定以錢先生對章氏之研究為題而草就拙文；先生之學術精神以至其為學終極關懷之所在，當可以概見焉。

文商夜學院」者，此見諸《唐君毅全集》（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卷29，頁70-71。今未審孰是。

- 3 此為筆者對錢先生作探討的第二篇文章。首文名為〈錢穆先生的治學精神—以《中國史學名著》為主軸作探討〉，發表於2003年秋台北東吳大學所舉辦之錢穆思想研討會上。（2005年10月該研討會論文經審查篩選後由東吳大學錢穆故居管理處編印出版，名為《錢穆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拙文亦收錄其中，頁285-314。）2004年6月中旬，筆者又應北京大學歷史系之邀，以〈錢穆先生的史學〉為題發表學術專題演講。此或可見筆者推崇、愛重錢先生學問之一斑。
- 4 筆者任職於台北東吳大學，而錢穆故居則為東吳大學受台北市政府委託經營之單位，江南大學文學院既有志於宏揚錢先生學問而舉辦研討會，則承乏東吳大學文學院院長並忝為錢先生之再傳弟子，且為東吳大學惟一與錢先生有學術淵源之教師，是以勉力草就此文。
- 5 至少在先生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章實齋〉一章中的表現是如此；至於錢先生對實齋頗有微詞，那是後來的事。（詳下文）
- 6 筆者之博士論文 *Recherches sur les travaux relatifs a Zhang Xuecheng (1738-1801), historien et philosophe, These du Diplome de Doctorat, Paris, 1987.*（中文可譯作《章學誠研究之析論》）便是研究章學誠的。之後嘗以博士論文為據，予以增刪或改寫而成以下各文：〈六十五年來之章學誠研究〉，《東吳文史學報》，第6號（1988年1月），頁211-236；〈同時代人論述章學誠及相關問題之編年研究〉，《東吳文史學報》，第9號（1991年3月），頁103-136；〈近現代章學誠研究評議〉，《章學誠研究論叢—第四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學生書局，2005年），頁11-33；〈章學誠研究述論——前人所撰有關章學誠對史學、方志學及目錄學之貢獻及影響述論〉，《東吳歷史學報》，第11期（2004年6月），頁303-327；〈近現代人章學誠生平論述之研究〉，《東吳歷史學報》，第13期（2005年6月），頁45-66。

錢先生研究、論述章氏之學說（含章氏之學術著作），主要見諸以下六書中之相關篇章：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⁷ 第九章〈章實齋〉（共 49 頁，不含附錄）；二、《中國史學名著》⁸，〈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章實齋文史通義〉（共三十七頁，若剔除不相關之黃全兩學案部份，則約為二十七頁）；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⁹，〈孔子與春秋〉第九節及第十一節之一部份（共六頁）；四、《中國思想史》¹⁰，單元四十二，〈章實齋〉（共三頁）；五、《國學概論》¹¹，第九章，〈清代考證學〉章實齋部份（共九頁）；六、《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¹²，單元二十三，〈記鈔本章氏遺書〉（共十頁）。以上六書，首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原自錢先生一九三〇年代任教於北京大學之課堂講義，前後凡五年始成書，¹³ 篇幅為六書中之最大者。次書《中國史學名著》則為先生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兩年間為文化大學研究生開課之演講紀錄。第三書《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收錄先生發表於 30 年代至 50 年代討論經學問題的文章四篇。第四書《中國思想史》篇幅最小；全書講述之單元計四十四個，但全書不足兩百頁。第五書《國學概論》乃原自民國十二年至十六年先生任教於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之講稿。¹⁴ 第六書為一論文集，其中〈記鈔本章氏遺書〉發表於民國二十五年。¹⁵ 六書中以第一書及第三書之論述及體例最為嚴謹。¹⁶ 第二書以其為演講紀錄，故內容較疏闊。¹⁷ 第四書篇幅最小，於實

7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6 年之版本。

8 台北三民書局 1974 年之版本。

9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78 年之版本。

10 筆者所用者為缺出版機構之 1975 年之版本（再版）。按：本書原由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1952 年出版。筆者所用者蓋為該版本之再版。

11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錢賓四先生全集》本，冊 1。

12 同上註，冊 22。

13 參該書錢氏〈自序〉。

14 該書初版於民國 20 年，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5 北平國立圖書館，《圖書季刊》，第 3 卷，第 4 期。

16 就第一書來說，先生論述一學者之各種觀點，其前後恆先引錄該學者之著作以為佐證；再者，先生論述某一學說時，必先以一小標題揭示其重點；段落之上又常以精簡之文字（有點像“眉批”）概括該段落之要旨。汪榮祖教授以「傳統的學案式綱目體」來描述錢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並認為該書「著作體例，引一段，評說一句，

齋之著墨亦不多。第五書以成書較早，且為概論性質，對實齋之論述，所見不深。至若第六書之相關論文乃錢先生記述其獲得《章氏遺書》鈔本之經過，並略及鈔本中所收文章之重要性；惟此文非直接研究實齋之學術思想者。是以今茲以第一書為主軸以論述錢先生對章學誠之研究；至於其餘各書，以至以上未開列之錢先生之其他著作，則備參稽而已。至於下文之敷陳，則一本錢先生第一書（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章實齋》一章）論述之先後以為序。蓋如此一方面可以忠實於原著；再者，可遂筆者偷懶之“私欲”，而不必另費心思、別創標目以綜括錢先生章學誠研究之論旨也。

二、錢先生對章學誠之論述

如上所述，本節主要依據錢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章實齋》一章之內容，依次展開錢先生之論說。

錢先生以二百多字之篇幅撰就章學誠（1738-1801）之〈傳略〉後，便用十二個小標題的來綜括章氏的學說。此十二小標題／細目，具見中文摘要，今從略。需要指出的是十二個標目中，除最後二目外，前十目均以成對之觀念來對比論述章氏的學說。這在闡述章氏思想之特色及凸顯章氏學說與當時學人之差異時，是很醒目奏效的。這個作法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其他章節中比較少見。茲依次敷陳錢先生之相關論說如下。

（一）《文史通義》與經學

錢先生治學的目的（至少目的之一）在於經國濟世。¹⁸ 同聲相和，同

不脫舊史藩籬，殊難暢述思想與學術發展之複雜過程。」汪說見所著《史學九章》（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164；160。

- 17 當然，嚴謹有嚴謹的好，言言有據，字字有考，研究成果自然可以經得起考驗；然其缺點則為作者恆不敢“跨越雷池半步”而作進一步發揮。疏闊則正相反，固可盡情發揮以成一家之言矣，然或由於缺乏佐證而流於天馬行空。
- 18 中國傳統讀書人恆有經國濟民之抱負。得君行道，當官從政，學而優則仕，是彼等最高之理想。但如果時不我予，如生當清代外族統治之世，讀書人（尤其具濃厚民族感情之讀書人，如清初明遺民）之理想、抱負，便只好“轉進”或所謂退而求其次了。讀書人所有者為知識，所憑藉之工具則有二：口也，筆也。因此可以藉口傳筆書（當

氣相求，彼所以特別欣賞章學誠，也正由於章氏治學的宗趣與他相一致。章氏經國濟世的用心，見諸代表作《文史通義》。¹⁹ 錢先生闡述章氏學術，開宗明義即指出說：「《文史通義》為針砭經學流弊而作。」²⁰ 清代考據學，其主要及起始之對象為經書，而次及於子、史。章氏生於考據學如日中天之乾嘉之際，對當時治經以文字訓詁六書七音之所謂專門之學為依歸的治學方向，深致不滿。當時之經學大師，其最具代表性者恐非戴震莫屬。章氏對戴震及其學問即嘗深予譏評。²¹ 錢先生深悉清代學風，是以指出《文史

然含口誅筆伐)來落實其理想。韓愈云：「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韓昌黎先生全集》，卷14〈答張籍書〉)口、筆之為用可謂大矣。這也就是所謂學術報國。當然，就清朝來說，學術報國也必得低調。口所言，筆所書不能涉春秋大義、華夷之辨；甚至以天下為己任之言詞也會觸忌諱。乾隆皇帝之言即可為證，其御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清代漢族讀書人也真的是夠委屈的了。

19 需要指出的是，章學誠原來並不是先定下《文史通義》一書名然後才撰述內中的各篇章的。而是先撰著若干文章，後來始用《文史通義》一書名把這些文章納入其中。而且直至章氏卒時，該書的內容到底該包含甚麼文章，尚未完全定案。章氏兒子華紱在該書〈序〉中便指出說：「……易箒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膝先生（王宗炎），乞為校定，……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膝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尚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冊，……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為付梓。尚有……，當俟校定再為續刊。」可知當時付梓的《文史通義》是經過章氏兒子華紱勘定後的結果，且明言以後再為續刊。然則章氏本人理想中的《文史通義》到底該包含些甚麼文章，那就真的只好存乎天壤了。正因為《文史通義》沒有所謂定本，所以一百多年來，學者或出版商便各憑己意而作增刪，於是便出現了不少不同版本的《文史通義》。這個問題，六十多年前便有學者注意到了，並著為文章發表。此即為張述祖所撰的〈《文史通義》版本考〉，收入《史學年報》，卷3，期1（1939年），頁71上-98下。

20 上揭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81。以下引錄錢書，其不明言出處而只標示頁碼者，概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21 劉知幾（661-721）「好談名理」，「輕議前哲」（二語見所著《史通》，〈自敘第三十六〉）、「工訛古人」。（出自《新唐書》，卷132，劉子玄等傳，史臣之〈贊語〉）一千多年後，同以史學批評名留千古的章學誠，更“變本加厲”，喜歡譏評時人。羅師炳綿對此最有研究，嘗撰〈章實齋對清代學者的譏評〉，收入《新亞學報》，卷8，

通義》為針砭經學流弊而作，並認為其中以〈原道篇〉之義理最為精粹之後，便對比論述實齋、東原學說之異同²²，藉以彰顯實齋學術旨趣及特色之所在。按實齋雖批評東原，但對闡述義理之〈原善〉、〈論性〉（按：全稱為〈讀孟子論性〉）諸篇²³，則甚為推許。²⁴

錢先生在本節中又特以「就經傳作訓詁與離經傳說大義」指出當時之經

期 1（1967 年 2 月），頁 297-364；其中便深入闡述實齋對東原的批評。倉修良更特別就實齋之批評東原撰著專文。見氏著〈章實齋評戴東原一章學誠史學研究之二〉，《開封師範學院學報》，第 2 期（1979 年），頁 50-57；惟文中指出「章實齋對戴東原褒大於貶」（頁 56-57），此則可謂深契實齋者也。

- 22 二人立說之異，計有三端。就經學而言，實齋始終認為六經不足以盡道。〈原道篇下〉之言詞最足為佐證。該文云：「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夫道備於六經」一語很容易使人誤會以為實齋認為六經足以盡道。其實不然。我們可以從該句之下文，尤其「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等語來貞定該句之確實意涵。其實，該語句猶等同說「夫道備於六經也者（所謂道備於六經的意思是），義蘊之匿於前者，……」。所以「夫道備於六經」一語不是一句正面的、肯定的判斷（affirmative statement），而是一句作為引起下文討論的中性句子而已。至於東原，則正如同錢先生的說明，「東原始終立論不脫因訓詁考覈以通經，因通經以明古聖人之義理，而我之義理亦從而明。……」（頁 383）。換言之，東原認為六經足以盡道，為道之所寄也。此外，二人對「理」亦有不同看法。錢先生云：「東原言理，主從人之情欲求之，謂理者情之不喪失者也。……實齋言理，則本事物。」（頁 385）二人立說之另一相異點則為對修志有不同的看法。東原主詳沿革（指地理方面），而實齋則主重文獻也。錢先生在本節中對這三點相異之處皆有所闡述，一方面可使人認識當時重要學說在立論上之差異，更要者為可藉以凸顯實齋與時人不同之卓見。錢先生善於為文並意在彰顯實齋學說之用心，於此可見一斑。
- 23 〈原善〉有上、中、下三篇，約二千餘字；〈讀孟子論性〉計一千餘字。兩文見四部叢刊本，《戴東原集》，卷 8。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安徽古籍出版社，1995 年）冊六亦收有該二文，見頁 343-348；350-352。
- 24 相關文字見《文史通義》，內篇二，〈書朱陸篇後〉；《章氏遺書·補遺·又與朱少白書》（台北：漢聲出版社，1973 年），頁 1368b-1369b。錢先生特別注意到實齋、東原學術之異同。此一關注可說後繼有人，其人即為錢先生之高足余英時是也。余氏嘗撰《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6 年）一書。書中雖非全然對比論述二人之學說，但研究清中葉學術而特拈出此二人，則二人在余氏眼中的清代學術之地位可以概見了。

師與實齋治學精神之不同²⁵。這使人想起宋儒陸九淵的名言：「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²⁶一語。象山固語出驚人，讀之使人震撼；其實，實齋「離經傳而說大義」一語，其精神、旨趣正同，顧不若象山語之斬截而使人震撼而已。大義者，正係本之所在也。苟能掌握之，則何必非經傳不可！是以離棄之可也，或僅視之為註腳亦可也。實齋云：「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²⁷實齋固浙東產也。而上引實齋「離經傳而說大義」一語，正可以作為浙東之學「多宗江西陸氏」的佐證。

（二）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

實齋之學術面向很廣。錢先生上節論說完畢實齋對經學之看法之後，便馬上論說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之差異，而不論說其他，這可以看出錢先生的論述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有機的序列。何以言之？蓋「實齋與東原論學異同，溯而上之，即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之異同」也（頁386）。是以錢先生以東原為對比，藉以闡釋實齋經學上的意見後，便接著論說兩學派之異同。《文史通義》有〈朱陸〉及〈浙東學術〉二文，這正可提供錢先生論述實齋相關意見之素材。

本節之重點計有：

（1）實齋認為戴學原出朱子，²⁸然指出戴氏最詬病朱學。此於〈朱陸篇〉可見端倪，惟實齋於篇中未明言其姓名。〈書朱陸篇後〉則指名道姓矣。錢先生云：「……時東原猶未卒，故隱其名。後又為〈書後〉一篇，始明說〈朱陸篇〉為正戴而發，則東原已下世十餘年矣。」在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錢先生論學是非常有先後時序發展觀念的。實齋批東原見諸二文，然一隱其姓名，另一則明言之。何以故？一般學人恐不甚了了，而分別引錄實齋醜貶東原的意見，隨後並作申述就是了。錢先生則不然，而必予以考證／指

25 「離經傳而說大義」一語，見〈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校讎通義》，外篇（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54。

26 語見《象山全集》，卷34，〈語錄上〉近起首處，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27 《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28 細言之，朱學經數傳而至顧炎武。而顧氏學術被實齋視為浙西之學，其精神為尚博雅。（參〈朱陸篇〉、〈浙東學術〉）

出二文撰寫之先後；其間乃以東原之過世為分野。²⁹ 為怕東原反擊也好，或心存忠厚也好，總之，不予以指名道姓；東原卒後，實齋便“肆無忌憚”了。當然，我們不能確定實齋之指名道姓是否確實與東原之下世有關。但錢先生依常情常理而作出的判斷應該是很有說服力的，至少這是一種很有啟發性的解讀。

(2) 實齋認為浙東之學源出象山。(頁 388)³⁰ 〈浙東學術〉云：「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錢先生云：「實齋……自述學統則不歸朱而歸陸，不屬浙西而列浙東。」³¹，至於兩學派之異同，要言之，乃在於「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³² 實齋自歸學統於浙東，³³ 乃因為其學不尚文字、訓詁、聲韻等等所謂無所不包之博雅³⁴，而僅尚專家之學故也。但這裡的「專家」千萬不要被誤解為與通識、通才相反的「專家」。其實，實齋最重視通³⁵，所以絕非要成為一個只通一經，只懂

29 一個學人在不同時期所撰寫的文字很可以讓我們了解其人學術思想上的發展演變。所以文字編年／繫年是很關緊要的。譬如以孔子論仁、論君子來說。我們通常說孔子因才施教、時而後言。所以我們便說孔子對「仁」、對「君子」會說出眾多不同的定義／說法。然而，如果能夠考證出孔子不同說法在時序上的先後的話，我們便會知悉其思想上發展的脈絡，說出這是他思想上的演變，而不會只把他的不同說法齊頭的解釋為因才施教、時而後言的結果而已。錢先生對此大概很有會心，所以特別彙編〈實齋文字編年要目〉作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章實齋》一章最後的一節。

30 其實以浙東之學源出象山是不無商榷餘地的。參王鳳賢、丁國順，《浙東學派研究》，第 1 編、第 2 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然而實齋認為浙東源出象山亦不可謂全是胡扯亂謔。蓋實齋從精神上言之矣。象山為學尚簡約，此與實齋所認為的浙東不尚博雅而貴專家，正相契合。如與浙西相比，則浙東學派固與象山為近。

31 錢先生立論所據為〈浙東學術〉一文。細閱該文，可知實齋的確自歸學統為屬於浙東，然並未明確的作出相關的自述。錢先生用「自述」一詞，則稍嫌過當。

32 《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33 實齋學術面向廣，然而，自以史學為主軸，成就亦最偉。至若其史學與浙東可有之關係，蘇慶彬先生嘗探討之，可參看。蘇慶彬，〈章實齋史學溯源〉，《新亞學報》，卷 8，期 2（1968 年），頁 375-412。倉修良先生嘗為文逕論實齋與浙東史學的關係。倉修良，〈章學誠與浙東史學〉，《中國史研究》，第 1 期（1981 年 3 月），頁 111-123。

34 其實，說好聽是博雅，說難聽是支離破碎。象山不是說過嗎：「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見上揭〈鵝湖和教授兄韻〉，《象山全集》，卷 25。

35 《文史通義》有〈釋通〉、〈申鄭〉等篇皆可見實齋對通的看法。

一藝的專家。他所謂的「專家」是指成一家之言的專家；就是要具備通識、通觀而其學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專家。蓋非專不足以成家。實齋云：「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³⁶ 可知實齋所謂之專家乃扣緊能獨立自成一家之言來說的。

(3) 「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³⁷ 實齋此一意見，錢先生特別予以指出推崇。其實錢先生本人之治學態度即如此，³⁸ 這可能就是為甚麼他特別欣賞上實齋的原因。「宗主」好比主軸，好比核心，好比凝聚點，為學者缺乏之，則其學問便像一盤散沙，無所依歸。縱然所謂學問廣博，恐怕也只是瞎博、會丟書袋而已；成不了家的。門戶則好比關卡，好比藩籬，為學者設置之，則其學問便不能有所擴展開拓，亦不能與他種學問有所貫通交融。縱然有宗主，則其所謂宗主，恐怕也只是關起門來做皇帝、自以為是、妄自尊大、尊己守殘的一種陋見淺識而已。³⁹ 實齋「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之意見對生長在地球村的今天的我們來說，尤具啟示性，蓋尊己守殘之學者一定會被時代揚棄。余英時描繪錢先生的學術精神說：「錢穆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⁴⁰ 「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正可謂治學須有宗主的最好註腳；「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正係無門戶的最好註腳。錢

36 《文史通義》，內篇六，〈假年〉。

37 《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38 錢先生的高足余英時教授對其師說最有會心，嘗云：「論學不立門戶，是錢先生從早年到晚年一直堅持的觀點。」見〈錢穆與新儒家〉，《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頁31。

39 茲以航空器為例舉一淺譬，無宗主好比無發射基地，甚至無火箭；有門戶則好比有圍欄障礙。既有基地矣，又有火箭矣，然以圍欄所擋，則發射無法及遠也。行文至此讓人想起唐君毅老師。老師學問最廣博，中西印無所不通，亦無所不精。然而老師始終歸宗儒家（青年時頗崇尚西學，然只是一短時期而已）。以儒為宗，視儒家為最高之價值所在，此固然；然而老師從不貶視其他學術／學派，而必承認有一定的價值。老師心胸本自廣闊，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恐怕老師深深的認識到，如劃地自限，設門立戶，心存入主出奴之見，則其所謂以儒為宗的宗便只是一池死水；愛之適足以害之而已。作為一個新儒家，固當含發揚光大儒家思想、儒家精神之義務。；老師廣納異同、融攝百家之治學胸懷、抱負，自然令人激賞讚嘆。

40 上揭《錢穆與中國文化》，頁13。

先生固如此，實齋亦近是，此所以錢先生特別激賞實齋也。

(4) 「史學所以經世，非空言著述。」⁴¹ 此乃實齋論學之一貫旨趣，錢先生本人亦如是，不具論。

實齋論學之精神見於本節者大體上不離乎上述四要點。上文之論述尤著重指出錢先生與實齋契合之處，藉以見錢先生欣賞實齋，正以其氣味相投也。⁴²

(三) 經學與史學

上節錢先生論說實齋對東原之批判並進而敷陳實齋對浙東、浙西學術之見解。本節承接之，錢先生以為兩派之學術重點為前者重史，而後者重經。錢先生並進而論說經史之關係。先生云：「浙西講經學，浙東重史學，實齋《文史通義》唱六經皆史之說，蓋所以就當時經學家以訓詁考覈求道之流弊。」(頁390)有關實齋救經學流弊的意見，上文〈《文史通義》與經學〉已有所述說，今從略。本節之其他重點則有二。一為錢先生特別引述《文史通義》〈史釋篇〉以敷陳「史」者何義。二為引述〈史釋篇〉外，錢先生並引述〈易教上篇〉及〈經解上篇〉以說明實齋「六經皆史也」何義。⁴³ 要言之，六經非空言；是以學經、尊經以求道者，當學其精神、尊其精神，即不當捨當身事物人倫日用，以尋之於訓詁考訂。再者，六經乃當時之史(當

41 《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42 錢先生本節論述所據主要是《文史通義》〈浙東學術篇〉及〈朱陸篇〉。其中〈浙東學術篇〉的若干論點，尤其實齋自道其學術淵源出自浙東，錢先生不是很贊成的。先生在上揭《中國史學名著》中說：「章實齋自己說，他的學問屬於『浙東學派』，是直從陽明下來的。章實齋又稱顧亭林為『浙西學派』。章實齋這一講法，我並不認為很可靠。……但他自己認為他是浙東學派，從陽明之學來，這一點，我實並不很欣賞。」(頁312-313)有關浙東學派源流及其間心學、史學等等問題，可參王鳳賢、丁國順，《浙東學派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43 學人針對「六經皆史」的問題討論至多。該命題或類似命題的「原創者」為何人、該命題何義、在實齋心中又何義、以至實齋何以提出該命題等等問題，學者皆嘗究心。相關論著目錄，可參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章學誠研究論文著作索引·史學理論〉，《章學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年)，頁457-462。余英時對這個問題亦嘗關注。余英時，〈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與「朱陸異同」論〉，收入《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店，1976年)，頁45-81。

時之政典)而已,雖可道盡當時之道,然不足以盡後世之道也。

本節最後有一數百字的雙行夾註,頗重要。其一指出實齋對後世之影響。此中計有包慎伯。錢先生以為包氏論吏弊、改吏為史⁴⁴及通公卿吏胥而一之的構想皆來自實齋。再者,清中晚期公羊今文改制之論,如龔自珍所倡議者,「其實與六經皆史之意相通流」。⁴⁵(頁392)是以,依錢先生意,包氏及龔氏等學人皆受實齋之影響。

雙行夾註中更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錢先生批評梁啟超,惟未嘗明言其姓氏耳。先生云:「近人誤會六經皆史之旨,遂謂流水賬簿盡是史料。嗚呼!此豈章氏之旨哉」(頁392)。於《中國史學名著》中,錢先生則指名道姓的說:「……梁任公曾說:賣豬肉鋪櫃上的帳簿也可作史料,用來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其他情況。這豈是章實齋立說之原義?」⁴⁶錢先生也批評胡適誤解「六經皆史」之「史」字。先生云:「……這個『史』字,我們近代學者如梁任公,如胡適之,都看錯了。」⁴⁷按:胡適嘗云:「其實(章)先生的本意只是說『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說法,便不難懂得了。」⁴⁸帳簿是史料也好,一切著作是史料也罷,反正都是史料。然而,錢先生絕不同意把「六經皆史」之「史」字解讀為「史料」,蓋先生認為此絕非實齋意也。⁴⁹

44 錢先生嘗順著實齋意而進一步談「史」與「(書)史」的問題,此見上揭錢氏《中國史學名著》,頁315。

45 「六經皆史」說與今文學家及龔自珍之淵源關係,亦可參錢氏《中國史學名著》,頁315-316。今文學派,如龔、魏諸人之采獲實齋之言者,錢先生於所著《國學概論》中亦道及之。見《錢賓四先生全集》本冊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不標年份),頁338。

46 錢氏《中國史學名著》,頁314。

47 同上註。

48 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頁105。

49 依錢先生意,六經乃王官之學,豈賣豬肉鋪櫃上的帳簿的所謂史料可以比擬!先生嘗云:「……所謂六經,其先皆官書也。即王官學。章實齋謂六經皆史,即謂六經皆政府中(或衙門中)一種檔案或文卷。章氏所謂史,即政府中掌管檔案文卷者,如周官中之五史皆是,與最先廟祝之史不同,因之史之所掌亦謂史,故曰六經皆史。」錢說見所著《國史大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72。筆者則以為,政府中(或衙門中)的檔案或文卷,如用作歷史研究,則正係今人所說的史料。其性質與賣豬肉鋪櫃上的帳簿(可作經濟史料用)實同。吾人心目中因為恆有一六經地位極崇

(四) 學問與功力

錢先生本節以「學問與功力」作為標題。實齋對於這個問題作深入討論的見諸〈博約中〉一文。實齋云：

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

一言以蔽之，這是說必須本乎性情，盡乎功力始可以成就學問。

成就學問，為甚麼必須發乎性情？我們翻看一下《文史通義》中的數通〈家書〉便清楚箇中原因。原來實齋本人之成學過程及契機便是如此。所以實齋是以過來人身份來說話的，並非放空言。〈家書六〉云：

二十歲以前，性絕駘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縱覽群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至吾十五六歲雖甚駘滯，而識趣則不離乎紙筆，性情則已近於史學。塾課餘暇，私取左國諸書，分為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

實齋治學之天性為近於史學（性喜史學），實齋本人明確道之如上。〈家書二〉又云：「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蓋有天授」，即源自天性之謂也。「發凡起例」，即創發義例（大義）之謂也。既本天性以創發史學大義，則餽釘考據訓詁固為所輕也。〈家書三〉最可以說明此點。該書云：

高之印象；然而，如被視為只是史料，則其地位便等同於賣豬肉舖櫃上的帳簿之同為史料！這是一般人驟然間無法接受的。然而，這是吾人自身心理上有待克服的問題。六經本身固係神聖製作，惟就歷史研究之角度而言，固可視為史料也。換言之，六經實具備雙重性格。